

事件观

没有人能还她一个美好的童年了

陈倩儿

从来没有人告诉10岁的龙张欢，童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活法。她是湘西凤凰县乡村里的一个小姑娘，自6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起，她开始背着8个月大的弟弟去学校。如今，弟弟长大了，她又接着抱起了两岁的小表弟。这样的童年在当地人看来再正常不过。然而近日，她生活的瞬间经过支教志愿者用相机定格，并上传网络后，一下子击中了无数网友的心。

照片中，扎着马尾辫的龙张欢坐在乡村小学的课堂里，怀里紧紧搂着睡得正香的小弟弟，她自己似乎也陷入了沉思，几乎合上了双眼，顾不上课桌上摊开的课本。

企及的奢望。自从父母离婚后，龙张欢已经3年没有见过妈妈了。今年5月，她的爸爸在离家3年后曾短暂返乡，随即又匆匆上路，奔赴杭州打工。

我们无法责怪父母狠心，有意遗弃孩子。在贫穷的湘西苗寨，城市无疑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，招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背井离乡。这些热火朝天的城市急需打工者的一双手，却并无弱小的孩子们的容身之处。于是，打工者的身后留下了一个，两个，无数个龙张欢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，仅在2009年

度，就有2.3亿中国人从农村涌进城市，而被他们留在身后的孩子，大约有2000万。这一群孩子被迫适应没有父母在旁的日子，甚至，替代了父母在家庭里的角色。

在3年前志愿者所拍摄的照片里，7岁的龙张欢正走在上学的路上。她用两根纤细的手臂托着背上1岁多的弟弟，一双小手为了使上劲，狠狠地拽着身上的衣服。尽管从家里到学校只有几步路，但汗水已经浸透了她额前的刘海。走到校门口，龙张欢不得不卸下弟弟，靠在墙上歇一歇。

在龙张欢就读的小学校里，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特殊，带着弟弟妹妹去学校的

大有人在。同学们常常抱着孩子听课，背着孩子玩耍，下课了，还自觉地手把手教孩子学写字。

他们还是一群小学生，却又俨然成了一群小爸爸、小妈妈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各种任务、责任与压力像噩梦一般无休止地纠缠着他们，夺走了童年最珍贵的礼物——玩耍与欢笑。

这样的成长过程，必定带着外人不可理解的痛苦。曾在苗寨的乡村小学任教7年的吴建辉至今记得，一天课间，龙张欢看着一些同学在快乐地跳绳、踢毽子，突然把手中的弟弟放在地上，冲向了操场。不料，弟

弟嚎啕大哭，内疚的龙张欢马上又折了回来，抱起弟弟后，自己也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。

在外人看来勤劳、懂事的龙张欢大概也说不清楚，自己的内心其实有着怎样复杂的情绪。一旁的老师甚至担忧，这个小女孩的内心是否太缺乏亲情与温暖，她长大以后是否会因此变得叛逆，或者孤僻，而那种看似坚韧又不可回应的城乡差距，又将在这个孩子的身心烙上怎样的印记。

这种种的疑问还无法在当下获得完美的答案，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没有人能还龙张欢一个美好的童年了。



感动、心酸、揪心，一下子成了网友们讨论的关键词。或许是想了解详情的人太多，这所乡村小学疲于招架，竟然开通了官方微博。由此，一个常常听闻却无从走近的群体的生活，得以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在龙张欢的家里，孩子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大人。两位老人的四个子女，统统和伴侣一起离开老家，或是打工，或是参军。眼下的屋檐下，只剩下8个孩子与两个老人。

患病的爷爷站立不稳，奶奶也起早摸黑地忙着农活。在缺乏成人庇护的世界里，8个孩子只能互相扶持，互相拉扯。

他们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，与自己同龄的孩子们怎样度过童年——反正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跳过童年，被不可回避的外力拉扯着，早早地走进了成人的世界。

他们最小的才两岁，最大的12岁。能自个儿走路的，每天负责砍柴、割猪菜。家里的饭菜，12岁的大姐姐独自承担。山上的泉水，则一个搀扶着一个去汲取，洗干净的衣服，又分担着一人一点儿地背回家。

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，他们本应躲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，撒娇玩闹，任性淘气，又或不顾一切地发一场脾气。这一切，普通孩子最自然的生活，却是留守孩子们不敢

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蹉跎

上山·下山

10月24日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内，正在展示艺术家计文于的作品《上山·下山》。悬挂的两条巨型条幅上“插”满了小布人，远看就是此起彼伏、汹涌澎湃的“人潮”，用以演绎上班族的奔波生活。

马骏撰

本报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

与“明星知青”那些充满豪情壮志、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，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来自另外一个角度。

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“知青生活馆”，这种记忆被隐藏在琐碎的物件里：知青情况审批表、光荣证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、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……而它们的主人，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“成功者”，而是知青中那些最普通的人们。

作为博物馆的馆长，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“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”，无论它们是“彩色还是黑白”。

“对于全国1776万名知青，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。”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产商人说。

事实上，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，很多人的确觉得，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，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记忆，仿佛从另一个角度“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”。

结束知青生活之后，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迥然不同的方向

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，满满一面墙的“非正常死亡知青”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。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，很多人在这里“第一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中沉重的部分”。

在此之前，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、浪漫、甚至荒诞的经历：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而自豪，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，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，自己一定嫁给他。

相比之下，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，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。

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上。“对我而言，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。”他说，“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，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平等的。”

这样的“民间视角”，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。2004年，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，投资2亿多元，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，建造“知青博物馆”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。不过，等他把这设想变成现实，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。

“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，但评价也非常复杂，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，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。”樊建川回忆说，“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把握这个主题。”

最终，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，转而选择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：青

春。

10月16日，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中，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，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。目力所及的范围内，整个场馆的墙壁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。在这座“绿匣子”里，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。

在这里，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，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，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。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，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：“学英雄，见行动，彻底埋葬帝修反，红心支疆心不移，愿把青春献于她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时刻听从党召唤。”

“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。”老人说着，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来。

前来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共鸣。他们大多怀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，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小异：繁重的体力劳动，简陋的生活条件，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。

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，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迥然不同的方向。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，著名导演张艺谋、曾被评为中国“首富”的刘永好，成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。

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。知青们自嘲“公社化的时候下乡，城镇化的时候下岗”，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。

甚至，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，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。根据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，从1974年到1979年，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，原因大多是事故、打架，或者边境战争。

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：“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，也有锻炼，既有堕落，也有苦难。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，像万花筒一样丰富，五味杂陈。”

在博物馆中庭的天井里，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。他把老知青捐来的几千把镰刀、锄头、犁把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，又在中间撒了很多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。

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。“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。”



曾经的知青在博物馆里拍照留念。

樊建川说，“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，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。”

博物馆的理念就是，我们不说，让文物说话

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，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“博物馆的理念就是，我们不说，让文物说话。”他说，“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。”

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，知青运动始于1953年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》；1955年毛泽东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中提出，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，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。

从那时起，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，共有1776万城镇青年中止学业，来到农村。“当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。”樊建川说，“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。”

不过，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，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：为了未来收藏教训。

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：“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，也有锻炼，既有堕落，也有苦难。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，像万花筒一样丰富，五味杂陈。”

在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：“不会做假，不会干农活，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……”

他还记得，1975年，当自己高中毕业，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，尽管家长都“心里明白”，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

怀。等到真正来到农村，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，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产生一种“不寒而栗”的感觉。

“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，知青没有一个规定动作，我们没有选择。”樊建川说，“因为政策的不合理，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，而是反方向运动，最终固化了社会的悲剧。”

在知青生活馆，这些“教训”有些来自那些名人的展品，比如作家家铁生的手稿，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。但更多时候，这些“教训”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的展品传递的。在博物馆“知青磨难”的区域，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，而在博物馆的门口，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，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逝去的生命。

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的：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中，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，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。而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云南，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，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。

如今，这座被命名为“粉·樊”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。“在四川墙上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为‘粉子’，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。”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。

有人评价说，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“不可名状的力量感”；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，他把这些作品放在门口，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“打个招呼”。

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，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

不过，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，这样的“基调”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。在一场活动上，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，寄托哀思的时候，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。

“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。”这位老人说着，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，“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，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。”

在参观结束后，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，知青生活馆的展览“太压抑了，不能激励人”。

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，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“青春无悔”还是“青春有悔”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，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。

事实上，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，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“做减法”。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，希望“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”。

“你会发现，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。”他说，“有人夸大苦难，有人夸大欢乐，有人夸大成就。”

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，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。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，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，表演当年知青“原生态”的节目。可在演出中，他发现，同一个知青，同样的忠字舞，人们的动作却怎么都看“假”，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。

“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。”樊建川叹了口气。

他常常觉得，知青们似乎很刻意地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一些记忆里。比如当年最有特色的“对口词”，在这一回的演出中，没有一个知青愿意表演。相比之下，大家都爱唱一些更加“新时代”的歌曲。这位原本希望“展现知青生活原本样貌”的老知青只能安慰自己，“变化也是记录”。

作为曾经的知青，樊建川坚持，知青运动的确造成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、伤亡和牺牲，但它也“的确培养了一批人”。

“我们不能违抗天命，但我们这代人也没有垮掉，在适当的时候挑起了整个社会的担子。”樊建川说。在他看来，正是在知青运动中被“过早地入社会”，知青们大多特别能吃苦，对社会的洞察力特别强，心胸也特别豁达。

他更加相信，在“50后”的知青群体之后，“60后”和“70后”们，可能很难找到一种纽带，把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。

“知青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。”樊建川说，“我们被集体强制地入另一个轨道，经历了同样的无奈，大家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。”

作为其中的一员，他也希望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中，“真实冷静地”反映知青群体承担的、来自国家不可抗拒的命运，并且“记录命运大潮下每个人的悲喜哀乐”。

他常常体会到紧迫感。“知青正在加快速度走入历史，如今已经年届60岁的知青们，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。”樊建川说，“我们有责任把真相留给后人。”

死亡的声音

与小说一样，唐继清也与死亡遭遇了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已经无法留下遗言，这个四川农民全部的力气，都用来发出一种“嘶——嘶——”的声音。

那是他呼吸的声音。10年的切割工作让他的肺被粉尘生态摧毁，躺在病床上，这位矽肺病晚期的男人只能费力地仰起头，努力凑近氧气面罩，维系自己最后的生命。

“那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魔鬼！”他的工友在一旁愤愤地，不知道是在指责矽肺病，还是指责其它的什么。

他短暂的生命大半与这种名叫矽肺的疾病纠缠不清。从14岁到24岁的10年，他在工厂当切割工，在纷飞的粉尘中让疾病侵入身体；从24岁到34岁，病魔又一点一点掏空了他的生命。当他最后一次来到医院的时候，这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全身瘦骨嶙峋，干巴的双手布满吊针针孔，连护士都找不到下针的地方。

如今，距离唐继清的去世已经过去半年，可他最后时刻的影像仍然在中国的网络上不断传播，吸引着人们对这个沉默群体的注意。在这段不长的视频里，唐继清的女儿在他身旁哭喊：“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听话”，而他的妻子则伏在他身边，不断喃喃低语：“一定要坚持，我们一定要回家”。

唐继清没有回答，他只是艰难地伸着脖子，不断发出那种“嘶——嘶——”的声音。

那是求生的艰难呼吸，也是死亡逼近的沉重脚步。这声音已经带走了唐继清，也把60多万名同样患有矽肺病的普通人，笼罩在灰暗的阴影里。

死亡的礼物

美国人斯黛西·格林也遇到了死亡。不过这一回，死亡并非来自自杀，它还带来了礼物。

那是一个崭新的生命。在感受到头痛带来的头疼、重影和“身体震颤”的同时，这位41岁的中年妇女也沉浸在自己怀孕的喜悦里。她忙着给没出生的宝宝买衣服、买婴儿车，也为了这个幼小的生命放弃了化疗——医生说，那是唯一挽救她生命的机会。

她选择了自己的死亡。当女儿多蒂来到人世的时候，这位母亲的生命几乎走到了终点。癌细胞侵蚀了斯黛西的视力、声音，也渗入了她的大脑。她大多数时候都陷入昏迷，甚至连在女儿出生证上签字都没有办法。

当护士把女儿抱入病房，放在她的胸口时，这位病入膏肓的母亲竟然睁开眼睛，急切地找到了自己的女儿，并且“与她安静对视了几分钟”。

“那是一个完美的时刻。”格林的弟弟菲利普说。尽管他也知道，因为癌症的影响，格林已经没办法看清女儿的样子了。

死亡最终还是带走了斯黛西·格林的生命，当时，女儿多蒂才刚刚出生了23天。这是死亡带来的礼物，也是这位母亲用生命留下的纪念。